

信宜锦江大桥的今与昔

罗本森

在信宜的母亲河锦江河上,锦江大桥的名字始终与城市记忆紧密相连。从全民共建的时代地标到迭代新生的交通枢纽,这座桥的“前世今生”,正是信宜从农耕小城走向现代山城的生动注脚。

1976年4月,当第一辆汽车驶过锦江桥的双曲拱桥面时,锦江河两岸的欢呼声响彻东镇圩尾。这座横跨东江河的大桥,是信宜人用双手筑起的时代丰碑——1975年10月动工后,县直属机关干部、企事业单位职工与全县中学师生分批奔赴工地,以义务劳动的方式参与建设,人工运送沙石建材,在短短6个月内完成了这项艰巨工程。

作为当时县内最大型的孔式拱桥,锦江桥有着清晰的时代印记:桥长170米,主孔3孔各跨径40米,采用重力式墩台结构,能承载18吨载重汽车与80吨挂车;两侧人行道各宽0.75米,虽狭窄却见证了无数行人往来的足迹。建桥总造价仅30万元,耗钢材20吨、水泥200吨与2100立方米石块,每一项数据都镌刻着物资匮乏年代的坚韧与团结。

此后近四十年里,锦江桥成为信宜无可替代的交通核心与生活地标。它连接着两岸的商业区与居民区,日均车流量超1.2万辆,学生骑单车



旧锦江大桥

穿梭其上,主妇们经此前往锦江市场买菜,桥边的鸡爪档、牛杂摊飘出的香气,与“锦江桥牌”烟丝的醇厚一同,构成了几代人的生活记忆。那时的桥面虽常停满摩托车,却从不少烟火气,成为信宜人心“没到过就不算到过信宜”的标志性建筑。

2012年,随着一声巨响,这座承载了36年记忆的大桥在拆除中落幕。因年久失修产生的安全隐患,让它不得不告别使命,但“轰响”背后,是全城人的不舍与牵挂。

旧桥的拆除并非终点,而是新生的序幕。2009年动工

的淘金湾大桥率先接过使命,这座全长88.9米、宽30米的新桥以观光廊道为设计理念,按50年一遇防洪标准建设,总投资约500万元,从交通为主的桥梁转型为兼具休闲功能的风景桥,成为摄影爱好者镜头下的夜景亮色。

城市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歇。2024年9月,锦江新桥改造进入收尾阶段,这座跨越鉴江、连接金湖西路与金湖东路的桥梁,在10月1日正式开放机动车通行。改造后的新桥宽约60米、长88米,设置双向4车道,保留2.5米宽慢行道,彻底改变了此前仅能通行行人

与非机动车的局限。工程不仅迁移了原有绿化、铺设了沥青路面,更通过拓宽车道缓解了老城与城西片区的交通瓶颈,尤其减轻了学校接送时段的拥堵压力。

从1976年的双曲拱桥到如今的双向车道,锦江大桥的“身份”在变,但使命从未改变。旧桥是全民共建的精神图腾,新桥是城市升级的功能载体,它们共同在锦江河上书写着故事——前者载着“大碌竹”与烟火气的乡愁,后者载着现代化山城的速度与活力,成为信宜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永恒见证。

我的父亲

黄波

我的父亲是一位离休干部,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,也没有拿得出手的事业,只是一位在解放前就已入党的平凡的老党员。

我承认,我没有了解离休前的父亲,真正有一点认识的只是离休回家的老人。

父亲离开单位回家时,只是带着几件换洗的衣服,几箱书籍以及用报纸包了又包的一包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。

父亲把这面党旗挂在墙上,常常伫立其前。他经常组织村里的离退休干部及党员群众,一起学习他自费订阅的党报党刊。有不认识字的党员,就听他们读。他们学习讨论的话题广泛,从当年亲身打日本鬼子到解放战争,从改革开放到经济特区的设立等,都是他们在党旗下讨论的话题。

我参加工作后,由于调动频繁,加上党组织考察我也需要一个过程,每次回到家父亲都问我入党问题。只言片语间能感受到,父亲

很在意。我在参加工作的第十一个年头,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回到家告诉他这个消息后,他特地握住我的手说:“这差不多,以后要倍加努力。”我清楚地记得,这是记事以来父亲第一次与我握手,父亲的手是那么温暖啊!

由于工作的需要,组织决定派我到一新单位担任负责人。我回来与父亲商量。父亲考虑到我所学专业与现在从事的专业不一致,就说:“你为人所长(zhang),有何所长(chang)”也太小瞧我了。我脱口而出“我为人所长(zhang)必有所长(chang)。”我记住他鞭策我的话,努力学习新的专业知识,积极参加系统内的业务培训,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。经过努力,我多次被评为系统内先进工作者、县优秀共产党员,还多次当选为县党代表。真的有所长(chang)。父亲不是一个对物质有过多追求的人。他对离休生活非常满意,以至于在一年春节自拟对联

“风餐露宿成过去,清茶淡饭渡晚年”,这就是他对生活的感慨,也是离休生活的真实写照。让我意想不到的是,他常用绵薄的离休费资助乡亲邻里缴交学费、购买农资种子、解决老党员生活困难、乡亲外出经商务工路费等等。至于资助给出多少及借出多少,他从来没有对母亲和我提起过。在父亲去世时,直到看到在灵堂上泪崩的一幕,我才明白。我感慨父亲的慷慨与乡亲的诚实。

父亲时时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,从不以自己的离休待遇用于他人。由于他长期不用公费医疗,公医办的同志以为他早已过世了。有一次我母亲生病,让他用公费医疗证开一点药品,他说:“不行,这是离休人员的待遇,你不是离休人员,不能用。”我母亲反驳说:“要说贡献,我对革命也有,我的金戒指都给杨瑞芬四伯闹革命了。”父亲说:“比起那些

跟我打游击去世的同志,命都没有了,你的金戒指算什么。”他说:“叫‘满哥’(乡医)来看看就好了。”神情肃穆。我想父亲肯定是想起了一起跟他干革命牺牲的同志了。

真正认识父亲“威武史”是在电城文化客厅。在客厅展示的革命史上,有我父亲的事迹。这些他从来没跟我说过。我追本溯源,打听这些资料的出处。经过不懈努力,在中国共产党《电白党史》第一卷(1924—1949)第139页有父亲的名字,他还担任“组长”。《电白区红色革命遗址通览》41—42页有他的名字及事迹,也有我母亲所说的“金戒指”一事记载……以往种种。这也就是我家的红色基因吧!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,也是我父亲离世十七周年。父亲!请您放心,我会努力做好本职工作,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,锻炼好身体,廉洁奉公,发扬良好家风,把红色基因一代一代传承下去。

邻村伏坡的变化

陈冲

伏坡村位于我们村东侧,中间只隔一条宽约二米的小溪和一片农田。改革开放前,伏坡村穷,穷得连一个土地庙和一口井也没有。

按当地风俗习惯,逢年过节,村民必须带着“三牲”、香烛等祭品到村中的土地庙拜土地公,祈求一家老小平安、五谷丰登。伏坡村没有土地庙,只好请来我们村的土地庙焚香跪拜以求庇佑。这一点,我们村民同情,默许他们这样做。但一个村庄没有水井却是伤脑筋的事。试想,煮粥煲饭,洗菜洗衣,哪一样离得开水啊!故而,他们天天要到我们村挑水。要在平常倒也罢了,但遇上干旱季节,或者寒冬腊月缺水,伏坡村人还来挑水,那就更不行了。每每这时,他们白天不敢去,便改为深夜偷偷摸摸的来。开始没察觉,还可以挑,后来被我们村的村民发现了,便把打水的竹篙藏了起来。结果,他们三更半夜摸着黑来挑水,却找不到打水的地方。无奈之下,只好唉声叹气挑着空桶回去。想想,也实在可怜!伏坡村上年纪的人,应该还会想起当年的这些事。

吃食条件差,整天肩挑背扛,负重过度,久而久之,他们村不少男人到了中年便弯腰驼背了。人本来就矮小黑瘦,再加上弯腰驼

背,样子就更难看了。为此,附近村庄的人背地里给他们取了个绰号“人公丁”。

粤西有“年例”的习俗,我们村与伏坡村同属正月十五“年例”。“年例”前后三天,我们村均请外地粤剧团前来演出助兴。伏坡村自然请不起,吃完晚饭,村民便早早带着亲戚到我们村看粤剧,路上还风趣地说:“我们沾沾杨槐桐村的光,不用花钱睇大戏,几(好)爽!”看完大戏,在回家的路上,他们又议论一番:“回槐桐村佬,年年做大戏,确系有钱!”

年年“年例”看黄槐桐村佬的大戏,伏坡村人有点不好意思了,特别是村干部。有一年“年例”,他们的村干部破天荒请了一班戏金很低的木偶戏前来演出。我们村依然请的是粤剧团,粤剧当然比木偶戏好看。到了“年例”这天晚上,伏坡村大部分村民带着亲戚跑到黄槐桐村看粤剧,村中剩下木偶戏的人寥寥无几。用他们村民自己的话说“做戏的比看戏的人还多!”村干部的脸不知往哪搁,为稳住“军心”,保住这寥寥无几的“观众”,村干部急急跑到戏台前说:“村民们,这几晚看鬼仔戏记工分,享受做戏佬的待遇——同吃糯米糖粥宵夜(当年糯米糖粥属于美味

了!)”此事一传十、十传百,远近哄笑,“伏坡村人年例看鬼仔戏记工分,还有糯米糖粥宵夜,‘好日溜溜,乜事都有’,笑落大牙!”

我们村有篮球场,村中生个会会篮球。当年,无论是公社组织的篮球赛,还是邻村邀请的友谊赛,黄槐桐村球队是常胜将军,捧回的奖杯,拿回的锦旗不少。村中生穿的背心,均用红色油墨在背心前胸位置印上“黄槐桐村”四字,还在背心后面印上一个红色的阿拉伯数字。打球时穿,平时天热劳作、趁墟赶集也穿,出入甚是自豪。其时,伏坡村连个篮球也没有,更别谈夺魁争冠了。

但俗话说,江山轮流转,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现在的伏坡村今非昔比了,需刮目相看!一条宽阔的水泥大马路通过村中,两旁的楼房鳞次栉比,有的还装了电梯,门口两边摆着盆花,那气派不亚于城镇。村东隔一条马路便是杨梅墟,和杨梅墟连成一体了。马路两旁的楼房全部成了商铺,有的出租给别人,有的自己经营,亦商亦农,相得益彰。经济腾飞了,村民富裕了,探亲访友,出出入入,西装革履,以车代步,满面风光。后生仔找老婆要求的条件也高了,左挑右拣。娶回的媳妇,个个年轻貌

美,要文化有文化,要素质有素质,有的还是城里的大学生靓妹。出生的后代,男的帅气,女的秀气!

村中近年考上大学的有十来个,其中有考上中大的陈建华、华工的陈建明、暨大的陈星霖、华农的陈华幸,等等。这对于文化发达的大村庄算不了什么,但作为改革开放前连个高中生都没有的小村庄,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。还有,村中还有个读小学四年级的小女孩陈梓潼,近两年来先后获得中小学少儿春晚茂名分会金牌银奖、第九届“中传花少”语言能力展示活动广东赛区金奖、第九届“中传花少”语言能力展示活动全国三等奖、首届广东广播电视台青少年主持人大赛茂名市赛一等奖……我数了数她的奖杯和获奖证书,共计有十三个之多,真是山沟沟里飞出了金凤凰!村中还有自学成才的陈亚周,打篮球好生了得!连县市篮球队有时到省里或与兄弟县市进行比赛,都邀请他参加,还为村里培养了一支篮球队。童年的玩伴亚梅近日从家乡打来电话和我闲聊,笑呵呵地说,“今日我们村篮球队呀,不敌伏坡村了!现在伏坡村的球队啊,打遍全镇所有村庄球队无敌手!你说犀利不犀利?伏坡村的变化,太大了!”

面子与压力

王崇宁

近年来,媒体报道某些人一时想不开而自寻短见的事例屡见不鲜,其中有不少是与个人的面子问题或工作生活压力问题有关。鄙人也曾经历过几桩难以自证清白、令人无地自容的“污点”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池洞农中发生一起特大盗窃案。当时我在该校任教,业余做些电器维修工作。恰好教到一位宗亲小弟,他也喜欢电器技术,常来我房间动手学习。那时学校教职工中,谁家的电灯不亮或什么电器出了问题都找他帮忙。他做事热情又勤快,一时间,在学校乃至周边村庄都小有名气了。

春季学期开学的第三天刚好是星期天,学生缴纳的12元学费集中存放在财会老师宿舍,形成一笔不小的款项。那时社会风气淳朴,夜不闭户、路不拾遗,好人好事层出不穷。财会老师的宿舍与其他老师无异,无铁窗、铁门、铁柜。更让现代人难以想象的是,教师宿舍那公共巷道的间墙仅有两米高,轻轻一跃就能翻入。那个周日晚上,财会老师回房时发现抽屉被撬三处,600多元学费被人盗走了!随即向校长报告,池洞派出所和县公安局迅速介入侦查。这在当时已是大案了!

然而一个多月过去,案件仍无线索。听说公安干警排查了外圍所有可疑人员,判断非惯犯所为。校长断言:“问题一定出在内部!”于是请警方协助,从校长起,每位教师及家属均按取指模、脚模,随后扩展到每位学生。此法虽如大海捞针,效果却立竿见影:我那位宗亲小弟手脚僵硬、神色慌乱,不攻自破。

更大的麻烦接踵而至。案发是周六晚,其他老师均已回家,整栋楼仅我一人居住,且我的宿舍距财会老师宿舍不足十米。凌晨两点半前,那位宗亲小弟还在我房中学习修理电视机,之后才回学生宿舍。事发后,所有不利的舆论全部指向了我,说我为幕后推手。警察多次找我谈话,并将我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查了一遍,令我百口莫辩。诸如“不是你透露学费未存银行,他怎会知道?”“凌晨两点多还没睡,不是你在放哨吗?”“夜间稍有动静便传得远,你离那么近竟没听到?”“你常失眠,那晚怎会睡得那么沉?”等等议论不绝于耳。那时我还未成家,心中憋屈、压力之大,名誉受损之重,可想而知。三十多年后的一次学生聚会上,一位颜值学生还对我说:“老师,当年你们兄弟俩真够大胆的!”我听后仅一笑置之。

后来我申请调往县委机要局工作,未果。但我实在无法继续在该校待下去,几经周折,终于调离教育系统,转往县农机学校负责电教工作。静下心来后,我试图探寻过去的种种原因。听到透露,县委在政审时就有人提出那次盗窃案的疑点。更糟的是,校长还怀疑我偷电,理由是我整个暑假在校居住并修理电视机,竟只用了4度电。我调走后,校长在教师大会上通报我“偷电”。这令我十分无奈,因为我从未关注过自己的用电量。

一个月后,原校领导追来要求补缴电费,称学校抄表员核实我原用电量44度,但抄送财会时漏写了一个“4”字,要我补交40度电费!

此事令我啼笑皆非,唯有叹息命运弄人。历经风雨,我反而平静以对,表示不回去补缴,面子早已扫地;也不愿回去争执,任由他人评说。再说,此事怪不得校长,怪不得抄表员马虎,也怪不得财会人员没及时提出质疑,只能怪我命运多舛。

九十年代初,改革开放浪潮奔涌,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。农机学校抓住机遇,业务从机电教学转向汽车、拖拉机驾驶员培训,一度生意火爆。某日,我忽然想起许久未开电教录像设备,担心潮湿损坏,便前往电教室通风。不料眼前一幕让我心惊:日本原装进口“乐声”牌录像机不翼而飞!我急忙向领导及公安局报告。

问题更为棘手。电教室位于四楼顶层,正面门窗无撬痕,后窗水泥窗杆虽已腐烂,但离地十余米难以攀爬。县公安局干警又涉及我,遂动用刑侦技术手段。然而侦查结果显示的尽是我清晰的指纹与鞋印——因我是唯一的工作人员。或许因有池洞“前科”,警方未单独找我谈话,听说也未向农机局领导作任何推论。

数日后,局领导班子开会,通知我列席。领导们纷纷分析:有的说查过门锁仅三把钥匙,现仍齐全;有的推测我保管钥匙不慎被人偷配;有的认为盗贼不敢从正面爬入,尽管窗头玻璃早已损坏;还有的说未见他人手印脚印,不用问“阿贵”……局长未敢轻下结论,让我谈谈看法。我提出三点:一、钥匙交我之前是否有人配过;二、贵重物品竟无“三铁”防护,此类鸭舌锁仅防君子,用身份证一插即开;三、正面窗头无玻璃,白天无人敢爬,但夜间难保。我作为工作人员,没有我的痕迹反而不正常。当前应配合公安局侦查,而非凭空猜疑。况且我本人修理录像机,对此旧设备毫无兴趣。局长认为我说的在理,宣布此事暂搁,待警方破案。

此后,如同在池洞时,流言四起,总说我善钻管理漏洞。无奈之下,我选择不争不辩,也无力争辩。一年后,我被派往高坡乡文垌村驻村开展“社教”工作。某日,村书记叫我去接电话。我一听,是农机学校校长打来的,她高兴地告知我:“公安局已破案并追回了录像机,为你洗清了冤屈。今后,你要放下思想包袱,努力工作。”我只平静回:“好的,感谢!”——因磨难太久,已无大喜大悲。

俗话说,不打不相识。事后我专程前往公安局了解详情,因有位领导对我颇为熟悉。他告知,警方抓获一名东镇镇岭的盗贼,偷了一辆时兴的“嘉陵”摩托车。查验驾驶证,无摩托车驾驶证,却有拖拉机的准驾,领证时间恰与农机学校失窃案吻合,一审即破。盗贼供认是从楼顶后面吊绳入室行窃,因戴手套脚套未留痕迹。原录像机已卖至广西北流,现归还农机局。

人生多无奈,难尽如人意。我未为情绪所困,静心深思,或许这些磨难反成好事:县委机要局作为政治性极强的要害部门,何不向相关领导详陈我这次经考验的人生经历?

调动一切顺利,圆了我多年的机要梦。半年后,国有体制改革,农机学校不再属事业编制,原工作人员自谋职业。有朋友调侃:“哪儿好去哪儿,有福自然到。”

我在县(市)委机要局努力工作,很快晋升为副局长,四年后又升任局长。因本职工作及抽调负责市重点项目驻点工作等表现突出,获组织认可,退休前行政级别提至顶级——三级调研员。

言归正传。若当时我面对重大问题自暴自弃,或采取极端举动自证所谓清白,又有何用?平日总有人强调面子与压力,可谁无压力?谁没受过委屈?谁未被冤枉过?既然连死的气概都有,何以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呢?人既逝,清白何证?如此清白又有何意义?

无论男女,有心理问题就应与家人多沟通,勿埋心底。人非独立个体,其问题牵动整个家庭。若感压力大,失眠、抑郁,不妨换个工作环境。必要时切断与外界联系,到农村去寻块田地耕种,亲身体验自食其力的劳动成果,从中觅得喜悦。如今农村荒地众多,只要诚心投入体力劳动,抑郁不治而愈。谁见过耕田者患抑郁症的?

正如俗话所云: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抛开面子,直面压力,冷静思考,迎难而上;或转变方向,另寻出路,积极向上,笑对人生。

我总结出一句自认可成经典的话:面子是父母给的,是靠自己拼搏出来的,与别人无关。做事但求光明磊落,无愧于心。